

# 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 日台漢文交流的多重意涵\*

廖振富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

張明權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專任助理

## 摘要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是日治時期「日台漢文交流」的重要媒體，該刊主要內容包括傳統漢詩文與現代教育的啟蒙知識兩大領域。本文將以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為範圍，針對上述兩大類型的內容進行分析。包括藉由漢文學知識之引介與詩文創作，日人與台人進行交流之實際態為何？從知識傳播共享到詩文締交，其背後隱藏何種政治與文化意識？而掌握編輯與書寫權的日人編輯群，一方面以漢文為抒情及論述之媒介，極力展露其精湛的漢學造詣，使台人信服而倍覺惺惺相惜；一方面又透過論述文章，宣揚帶有殖民思維的現代性理念，以遂行其殖民目的，「漢文」在日人筆下充分彰顯其複雜多重的性格，難以簡單定位。更值得玩味的是，筆者發現該報主編三屋大五郎，曾巧妙挪用梁啟超在日本發表的文章，企圖改造台人之傳統習俗，其意義尤堪深思。1895年以後，台灣、中國、日本之間，在文化與政治場域充滿複雜的糾葛，而透過《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大量漢文文本的刊

\* 本文為筆者執行國科會計畫「日治時期在台日人漢文作品之整理與研究——以《臺灣教育會雜誌》為中心」（NSC 99-2410-H-005-051）之成果，由助理張明權協助完成。初稿曾宣讀於「重返台灣的近代」學術工作坊，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主辦，2013年9月21日。會中承蒙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黎湘萍、趙稀方等學者提供不少高見，激發思考，經修改後投稿本刊，又參考兩位審查人意見加以修訂增補，藉此一併致謝。

載與傳播，這些複雜面向究竟反映了哪些文化意涵？以上種種提問，將是本文重心所在。

本文首先檢討回顧相關研究成果，隨後討論《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沿革與宗旨，以奠定基礎認知。至於論述主軸，則涵蓋「傳統漢詩文交流」與「現代性知識傳播」兩大部分，前者以「台日漢文交流之樣態與多重意涵」為題，下分三點：「漢詩文知識傳播交流及資料來源」、「詩文交流的雙面性：從籠絡同化到尋求文學知音」、「在台日人展示漢文造詣及其意圖」，後者「現代性啟蒙知識的導入及其駁雜性」，則分別從以下三個面向進行分析：「殖民現代性的導入」、「所謂『除三害、興三利』」、「梁啟超〈禁早婚議〉被抄襲挪用的複雜意涵」。

關鍵詞：《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日台漢文交流、殖民現代性、  
三屋大五郎、梁啟超



# Multiple Readings of Inter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the “Taiw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Magazin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eiji Period

## Liao Chen-F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Chang Ming-Chuan

Research Assista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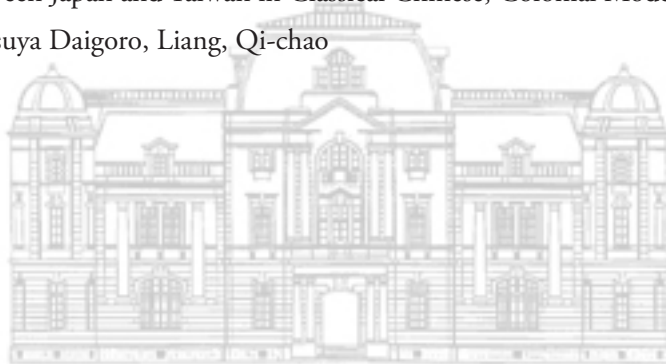
## Abstract

The “Taiw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Magazine Chinese version” was an important pres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of Taiwan regarding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Classical Chinese. It contained two main area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essays, and modern educational enlighte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wo areas by focusing on the magazine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It asks questions as follows: How is the interrelation shaped by introducing classical Chinese knowledge and literary works? What kind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as lie behi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literary network? The works of classical Chinese decipher a complicated picture in which two sides of colonial governance can be found. On the one hand, Taiwanese were convinced by the Japanese editors in charge of editing and writing, who showed off their refined capability of classical Chinese lyrics on purpose. On the other hand, classical Chinese, particularly essays, was used for colonial ruling by promoting modernity. What is more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chief-editor, Mitsuya Daigoro, intended to transform tra-

ditional Taiwanese customs by adapting Liang, Qi-Chao's essays published in Japan. The paper provides a cultural reading by looking into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henomena in the magazine regarding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China and Japan.

The paper starts with reviewing current relevant research work and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and objectives of the magazine. It continues to focus on two parts of interre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nd moder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The former includes three aspects: 1.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sources of classical Chinese knowledge, 2. Two sides of the interrelation: from assimilation to appreciation, 3. The skill demonstr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its intention by Japanese in Taiwan. The latter entitled "the introduction and complex of modern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includes 1. The introduction of colonial modernity, 2. Promoted "pros and cons," 3. The adaption of the essay "On forbidding early marriage" by Liang, Qi-chao.

Keywords: *Taiw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Magazine Chinese version*, Inter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Classical Chinese, Colonial Modernity, Mitsuya Daigoro, Liang, Qi-chao



# 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 日台漢文交流的多重意涵

## 一、前言

《臺灣教育會雜誌》創刊於明治34年（1901），為日治時期反映日本在台教育政策與實況的刊物。該刊自明治36年（1903）起增設「漢文報」，並持續二十多年。《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原先雖以教育政策宣導主要目的，但內容相當開放多元，除教育政策、教育訊息外，更涵蓋學術論述、史傳、筆記叢談、中國及日本漢文學知識之引介、台人與日人之漢詩文創作等。

由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發行時間甚久，牽涉的文本與台日作者群，數量都相當龐大，為集中焦點，本文將以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為範圍<sup>1</sup>，探討該刊日台漢文交流的多元意涵，包括藉由漢學知識之引介與詩文創作，日人與台人進行交流之實際樣態為何？從知識傳播共享到詩文締交，其背後隱藏何種政治與文化意識？而掌握編輯與書寫權的日人編輯群，一方面以漢文為抒情及論述之媒介，極力展露其精湛的漢學造詣，使台人信服而倍覺惺惺相惜；一方面又透過論述文章，宣揚帶有殖民思維的現代性理念，以遂行其殖民目的。「漢文」在日人筆下顯示其複雜多重的性格，實難以簡單定位。更值得玩味的是，筆者發現該報主編三屋大五郎，曾以「近乎抄襲、略加改寫」的方式援引梁啟超在日本發表的文章〈早婚議〉，企圖扭轉台人早婚之習俗，其意義尤堪深思。1895年以後，台灣、中國、日本之間，在文化與政治場域充滿複雜的糾葛，而透過《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大量漢文文本的刊載與傳

---

1 本文討論範圍，從該刊明治36年（1903）增設「漢文報」起，到明治45年（1912）為止。如此考量，主因是這個階段的漢文報，大抵由日本人擔任主編，常刊載日人漢詩文作品，更能反映日本官方教育系統，如何透過漢文雜誌與台人進行交流，並遂行殖民現代化的目標。

播，這些複雜面向究竟反映了何種文化意涵？以上種種提問，將是本文重心所在。

另需說明者，本文使用「日台漢文交流」一詞，而非「台日漢文交流」，實有特殊考量。由於《臺灣教育會雜誌》不但具有官方性質，且創刊初期的漢文報都是由日人編輯群主導，因此，日台間以漢文為媒介的交流活動與相關書寫，實具有「日人主導，台人呼應配合」的主從位階差異，並非雙向對等的交流。

## 二、先行研究回顧

目前台灣針對《臺灣教育會雜誌》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不算多，又吉盛清為《臺灣教育會雜誌》再版所撰寫的解說，可視為《臺灣教育會雜誌》研究的濫觴。此一題為〈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教育會の活動と同化教育〉的日文解說，原收錄於《臺灣教育會雜誌》別卷之中，後經台灣分館閱覽組漢譯，改題為〈臺灣教育會雜誌——再版記及內容介紹〉，並分上、下兩篇連載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上。

又吉盛清〈臺灣教育會雜誌——再版記及內容介紹〉<sup>2</sup>一文，以台灣同化教育政策為切入角度，分項討論《臺灣教育會雜誌》創刊、明治時期的沿革與重要記載等議題。透過此文介紹，得以初步掌握《臺灣教育會雜誌》在明治時期的發展概況，可作為進一步整理《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時的參考座標。更重要的是，又吉盛清在分析臺灣教育會的會規與雜誌發刊詞後，指出臺灣教育會是一個將「臺灣總督府之政策、指令、文宣傳遞到下層單位的任務機關」<sup>3</sup>，這意指「臺灣教育會」本身具備濃厚的官方色彩，並且反應在機關誌《臺灣教育會雜誌》的內容上面。

延續又吉盛清的腳步，室屋麻梨子〈《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sup>4</sup>，是台灣第一篇相關議題的學位論文。該文首先探討臺灣教

---

2 又吉盛清著，潘淑慧譯，〈臺灣教育會雜誌——再版記及內容介紹（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3卷2期（1996.12），頁67-88。又吉盛清著，潘淑慧譯，〈臺灣教育會雜誌——再版記及內容介紹（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3卷3期（1997.03），頁76-90。

3 又吉盛清著，潘淑慧譯，〈臺灣教育會雜誌——再版記及內容介紹（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3卷2期，頁70。

4 室屋麻梨子，〈《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育會的成立與發展過程，並分析該組織之幹部結構與經費來源，指出：臺灣教育會在性質上是一個接受臺灣總督府領導與補助的團體，該會與總督府密切配合，最終成為官方教育活動的執行機關。<sup>5</sup>對本文而言，這部分的研究勾勒出臺灣教育會的結構、特質與運作方式，是極其重要的外圍參考資料。

接續，經由針對《漢文報》創設與發展過程的整理，室屋麻梨子主張漢文報宗旨「就是透過漢文報的閱讀企圖養成台灣人教師的日本國民性格」，<sup>6</sup>而所設定的主要閱讀群則為台灣籍的教師，不僅針對有正式資格的訓導，更包含由漢文書房招聘的代用教師在內。<sup>7</sup>此外，在雜誌內容方面，文中除初步整理各專欄的刊載內容外，最重要的是指出《漢文報》雖附屬於《臺灣教育會雜誌》，但為貫徹同化之目標，故內容甚少相同於日文版，是一份專為台灣人讀者編輯的刊物。<sup>8</sup>這表示《漢文報》可以在與《臺灣教育會雜誌》相互配合的前提下，作為一份獨立的研究文本，這也確立了本計畫研究議題與材料的獨立性。

最後，論文焦點鎖定《漢文報》上「論議」及「傳記」兩個專欄，試圖透過專欄所載篇章內容的歸納，討論《漢文報》作為官方籠絡、宣傳暨同化工具之特色。透過室屋麻梨子的研究，可以意識到臺灣總督府透過臺灣教育會設立《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是針對台灣知識菁英，架構出以漢文實踐懷柔、灌輸同化的媒介管道，並期待透過這種操作，可以促使台灣人理解、認同日本，最終協力於總督府的官方政策。

但是，室屋麻梨子的內容分析僅止於「論議」及「傳記」兩個專欄，嚴格而論，並不足以反應《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整體內容，尤其對刊載在「文藝」欄內的日台漢文人詩文交流缺乏討論，而這正是筆者所欲深入鑽研的重要部分。

張瑜庭〈日本與台灣漢學連結：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

---

5 同註4，頁21。

6 同註4，頁64。

7 同註4，頁73。

8 同註4，頁73。

（1903-1911）研究〉一文，<sup>9</sup>是以《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內容為材料，探討日本在統治台灣初期對漢學的態度，並以「日、台漢學連結」為問題焦點。張瑜庭先分別針對追溯日本漢學與台灣漢學的發展淵源，並強調「漢學」是日本與台灣之間的溝通橋樑。再以此為背景，進一步討論《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發行狀況與內容。文中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整理出《臺灣教育會雜誌》的發行人與配送地區，數據化的研究成果，對於評估《臺灣教育會雜誌》的影響力極為重要。

其次，本文同樣也指出《臺灣教育會雜誌》日文報及漢文報內容有所差異，應當視為獨立刊物處理。文中除對其異同之處加以彙整外，還進一步分析漢文報刊載內容來源，指出可分為「讀者投書或編者編輯之原創稿件」、「演講或日文版內容翻譯」和「摘錄自其他作品的內容」等三大類。<sup>10</sup>

最後，張瑜庭集中討論《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中，「漢學」如何成為台灣與日本的連結橋樑，其指出「透過敘述日本學術歷史之文章……，讓台灣人對日本的學術歷程得以瞭解，甚至進一步因為瞭解有類似的學術背景而產生好感」。<sup>11</sup>除此之外，漢學也成為一種「新知識的催化劑」，因為刊物中出現以「已知的舊學連結新學」的嘗試，張瑜庭認為這是新舊交接時期循序漸進的發展方式。<sup>12</sup>

總體來看，張瑜庭這篇論文對於《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在日台漢學交流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較為深刻的論述。但其在討論詩話的過程中，將雜誌所刊登的詩話篇章，分為「來自中國漢學」與「來自日本漢學」兩類，但事實上張瑜庭並未發現：所謂來自中國的詩話作品，內容其實多是從日本的漢學刊物或叢書轉載而來，其中除了來自中國的原作內容外，尚有日本漢學者的評點與交流意見，如何看待這種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駁雜特質，乃是本文嘗試探討的方向。

9 張瑜庭，〈日本與台灣漢學連結：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11）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07）。

10 同註9，頁44。

11 同註9，頁120。

12 同註9，頁120。

陳培豐2013年7月出版的新著《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sup>13</sup>，第一章〈東亞漢文的「大熔爐」〉、第二章〈從明治體到「中國白話文」〉，都討論到《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第一章第三節「《臺教會》雜誌誕生」、第四節「《臺教會》雜誌的影響」、第五節「『殖民地漢文』的誕生與意義」，首先分析這本雜誌的時代意義，指出在扮演台灣漢文「啟蒙」刊物上的貢獻上，該刊遠比《臺灣文藝叢誌》更早。作者將該雜誌所刊登的漢文稱為「殖民地漢文」，進而考察這種特殊文體的形成，是由古典漢文、台灣式漢文、和式漢文、和製漢語等共構而成，大量被運用於傳播現代啟蒙新知，堪稱台灣現代化漢文雜誌的先驅。該刊更訓練、培養了一批出身國語學校的台灣知識菁英的媒體經驗，在1920年代以後更各自成為不同立場及語文主張的代表人物，影響深遠。

該書第二章〈從明治體到「中國白話文」〉，進而討論殖民地漢文的快速形成、普及，與《臺教會》雜誌刊登大量翻譯文章有關，並將1902-1907年由日人擔任主編期間，該刊「學術」、「論議」、「雜錄」各欄出現的翻譯文章，詳細列表統計。其目的在論定「殖民地漢文」與翻譯新學知識的關聯性，因為翻譯西方新知識、新經驗時，不得不藉助新的語彙與概念，因而引進大量日本新創的「和製漢語」。更值得思考的訊息是，本章作者指出梁啟超在日本創辦雜誌期間，大量翻譯日文文章，依賴的是當時日本出現以「帝國漢文體」大量翻譯西方著作。他認為梁啟超所謂「新民體」的文體，和「殖民地漢文」的文體結構基本相同，是由傳統漢文、和式漢文、和製漢語三種不同型式的漢字漢語構成，而「新民體」、和「殖民地漢文」能各自被中國與台灣兩地讀者接受的原因也相似。後來梁啟超在明治44年（1911）應林獻堂之邀請訪問台灣，從而對台灣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陳培豐的研究極具學術創見，不過他的關心焦點鎖定在「台灣語言文體的混雜性問題，側重分析「殖民地漢文」在現代性啟蒙上的貢獻與價值，

---

13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07）。該書第一、二章的主要內容，是以其期刊論文〈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臺灣史研究》15卷4期（2008.12）改寫而成。

至於《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大量出現的傳統漢詩文（作者包括日人及台人），並不在其研究範圍，且該文也並未針對文本的思想意涵進行分析。換句話說：他觀察的是該刊漢文文體的混雜性，至於該刊所載的古典漢詩文創作，其意義與定位何在，陳培豐並未作任何討論，而這類作品顯然不能納入所謂「殖民地漢文」的範疇。筆者認為，分析「殖民地漢文」對啟蒙意義的貢獻的同時，傳統漢詩文在該雜誌如何被看待或定位，仍是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而若能將兩者並行觀察，或許能有更全面的發現，這也正是本文關心的焦點。另外，筆者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上發現，主編三屋大五郎直接抄襲梁啟超〈禁早婚議〉的文章，用來鼓吹台灣人應避免早婚的理念（詳見下文），<sup>14</sup> 其背後訊息值得玩味，也可與陳培豐所提及梁啟超「新民體」的觀點進行對話。

除了以雜誌本身為考察對象，近年台灣學界陸續出現幾篇來台日本漢文學的個案研究，其中與本題較為相關者，分述如下。首先是李龍雯〈三屋大五郎在台之教育及文筆活動之研究〉<sup>15</sup>一文，針對刊物編輯三屋大五郎進行作家論研究。三屋以教職的身分，長期擔任《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主編，甚至連該報創刊宗旨，都是出自三屋的手筆，故這篇以三屋為課題的論文，可以視為本研究重要的外圍資料。論文整理三屋大五郎的出身背景，並指出三屋透過良好的漢文素養，以及擔任《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編輯之便，得以和許多日台文人結交。<sup>16</sup> 透過三屋這個個案，有助於本研究掌握日治初期日台文人詩文締交的脈絡。此外，文中也分析三屋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上屬名刊載的篇章，指出三屋透過漢文傳遞文明新知，<sup>17</sup> 這也有助於理解及定位《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作用。

除了三屋之外，《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另外兩個重要編輯，即初山

14 本論文第五節「現代性啟蒙知識的導入及其駁雜性」之（三）：「梁啟超〈禁早婚議〉被抄襲挪用的複雜意涵」。

15 李龍雯，〈三屋大五郎在台之教育及文筆活動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16 同註15，頁16、25。

17 同註15，頁46-54。

衣洲與中村忠誠，目前也已逐漸受到台灣學界的重視，開始出現學位論文，諸如程怡雯〈初山衣洲在台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sup>18</sup>與黃敬堯〈臺日漢文的跨界交錯：日治時期來台日人中村忠誠研究〉<sup>19</sup>等，這兩篇論文討論作家在台歷程與文學活動時，無可避免會觸及《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討論，有助於本論文由編輯群的角度，切入《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研究。

### 三、《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沿革與宗旨

#### （一）《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沿革

要探討《臺灣教育會雜誌》的創設與沿革，必須溯源至「國語教授研究會」的組成。明治31年（1898）9月18日，以研究公學校及國語學校的國語教授為目的，台北地區的日籍教師成立了「國語教授研究會」。<sup>20</sup>其活動以定期例會為主，先由會員透過例會提出國語教授的問題，再選派調查委員針對問題進行研討、調查，並提出解決之道作為國語教學的依據。<sup>21</sup>

其後隨著會員陸續增加與研究成果受到肯定，「國語教授研究會」於明治32年（1899）12月，在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內改組為「國語研究會」。該會計畫每月召開例會進行研討、演說等活動，每年開一次總集會報告會務等項目，以及每年三次刊行機關雜誌《國語研究會會報》，用以記載研討決議與演說的筆記等。<sup>22</sup>然而，受限於資金不足，《國語研究會會報》僅於明治33年（1900）5月發刊過第一號，收錄該會活動記錄、國語教授法的介紹，與國語教學相關報告資料等內容。雖然《國語研究會會報》僅發刊過一期，但這個發行機關誌的思考與嘗試，卻成為《臺灣教育會雜誌》發行的基礎，而被視為《臺灣教育會雜誌》的前身。

18 程怡雯，〈初山衣洲在台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07）。

19 黃敬堯，〈臺日漢文的跨界交錯：日治時期來台日人中村忠誠研究〉（台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07）。

20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台北：南天書局，1997.12），頁155-156。

21 室屋麻梨子，〈《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頁14。

22 國語研究會編輯部，《國語研究會會報》1號（台北：國語研究會，1900.05），頁1。

明治34年（1901）2月17日，「國語研究會」召開年度總會，以會員平井又八為首等九人，提議改組。後任《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編輯的劉克明，記錄平井的意見如下：

國語研究之事，教育上不可乎如也。然方今臺灣教育之趨勢者，不許專研一局部之事業而已。此所以欲變更組織，向諸方面研究也云。<sup>23</sup>

提議通過後，該年6月，「國語研究會」再次改組為「臺灣教育會」，並邀請當時的總督府參事官長石塚英藏擔任會長，學務課長松岡辨為副會長，國語學校校長田忠敬一為幹事長<sup>24</sup>，使得原本研究國語教育的民間研究團體，轉型為協力臺灣總督府推行教育政策的組織，隨後的幾次改組，更不斷加強與臺灣總督府之間的臍帶關係，致使「臺灣教育會」成為臺灣總督府教育活動的執行機關。

「臺灣教育會」延續「國語研究會」發行會報的經驗，在成立的次月，亦即明治34年（1901）7月，創刊《臺灣教育會雜誌》作為機關誌，起初為三個月一期的季刊，至明治35年（1902）8月，《臺灣教育會雜誌》第6號起，改為兩個月發刊一期，但在同年10月發行《臺灣教育會雜誌》第7號後，又變更為月刊的型態，此後便維持月刊的型態穩定發行。

明治36年（1903）1月，《臺灣教育會雜誌》第10號，試圖增加台灣籍會員與讀者，開始增設漢文報。明治45年（1912）1月，雜誌改題為《臺灣教育》，但期號延續不斷，仍採用流水編號的方式編為第117號，《漢文報》也持續附屬刊行。昭和3年（1928）1月，《臺灣教育》第305號，無預警廢止《漢文報》，《漢文報》由第10號延續至第304號，總計有25年的歷程，期間除少數特別紀念號因屬專刊性質，<sup>25</sup>沒有附錄《漢文報》外，僅有大正9年

23 劉克明，〈臺灣教育之趨勢〉，《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00號（1910.07.25），頁2。

24 〈臺灣教育會規則〉，《臺灣教育會雜誌》1號，（1901.07.20），原書無頁碼，封面後第3-5頁。

25 例如《臺灣教育會雜誌》200號「臨時增刊教育令紀念號」、222號「教育勅語御下賜三十週年紀念」等特別紀念專刊。

(1920) 8月1日的第219號，因編輯劉克明個人事故而休載一回。<sup>26</sup> 昭和18年(1943) 12月，臺灣總督府為因應戰爭體制，規定官方發行刊物需統一發行，導致《臺灣教育》在發行第497號後停刊，<sup>27</sup> 總發行時間長達41年，幾乎貫串整個日治時期。

## (二)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宗旨與內容

臺灣教育會的宗旨，其會規第一條載明：「本會者，為圖臺灣教育之普及及改進起見而設」，<sup>28</sup> 對此《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首任漢文編輯三屋大五郎，曾在〈設漢文報宗旨〉中如此闡釋：

今夫本島幸免為漢土之屬隸。均承本邦文明之化。爾來教育駸駸日進。其業頗有可觀者。然教育大業。非惟政府法令以能可完功者。必待有志者盡心盡力。而後可成功矣。於是當本島教育之任者相議。欲益振起教育。自前二年。創設本會。專圖之普及改善。<sup>29</sup>

文中清楚指出臺灣教育會協力政府普及、改善台灣教育的創設目標，這突顯出該會翼贊臺灣總督府施政的官方色彩。而作為機關誌附屬的《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其成立宗旨則為：

本會每月所發行之雜誌。邦文記之。洵不便本島君子之閱覽。由此新設漢文報。以便本島君子。並為研智修德之地。敢望本島君子。奮為會

26 《臺灣教育會雜誌》219號(1920.08.01)，頁40。

27 《臺灣教育》停刊的期號，是一個尚有爭議的課題。又吉盛清與室屋麻梨子皆主張停刊於第498號，但中島利郎在台日兩地幾番搜索皆不得見，故根據第497號〈編輯後記〉記錄：「這回官廳的雜誌廢合整理之際，文教關係八誌，決定皆於十二月號廢刊，同時更以教育為中心成為一誌的創刊。因此，本誌於此暫且停刊，改由面目一新的新誌，從新年號繼續發刊。請本會員諸賢能同此誌一樣愛護。」，認為《臺灣教育》停刊於昭和18年(1943) 12月的第497號。筆者認為〈編輯後記〉指出雜誌於12月號廢刊，而第497號便是12月號，故採取中島利郎的觀點，認為第497號即為《臺灣教育》的最後一期。參見中島利郎、宋子紘編，《臺灣教育——總目錄·著者索引》(台北：南天書局，2001.10)，頁777-778。

28 同註24。

29 三屋大五郎，〈設漢文報宗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0號(1903.01.25)，頁1。

員。協同竭力。以期啟發本島。且振豐富之筆。出心中之奇。有裨於斯教育。<sup>30</sup>

文中強調設立漢文報，是希望透過漢文，將教育方針傳達給台灣知識菁英，並且希望台灣知識分子，亦能透過漢文報發表作品，協力於殖民地教育工作。這表示《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作為機關報《臺灣教育會雜誌》的漢文欄，亦緊扣著傳遞總督府政策的使命，具有鮮明的官方色彩。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每期頁數約略維持在20頁上下，篇幅雖不多，但經過長時間的累積，依舊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材料。此外，採取獨立編輯的《漢文報》，依照內容取向，將篇章納入各專欄內，基本上包含「論說」<sup>31</sup>、「學術」、「實驗調查」、「文藝」、「史傳」<sup>32</sup>、「雜錄」<sup>33</sup>、「內外彙報」、「會報」、「通信」等專欄，每一期經常刊登四至六個專欄不等，刊載內容與《臺灣教育會雜誌》重複者並不多。後期，《漢文報》的內容受到刪節，自大正8年（1919）10月第209號起，僅存「雜錄」、「文藝」與「通信」三個專欄，反應出《漢文報》逐漸式微的狀態。

綜合觀察，上述各專欄，依其內容性質，大致可區分為三大區塊，首先「論說」、「學術」、「實驗調查」三個專欄，內容以宣揚總督府政策、介紹科學社會新知或教育理論為主，以《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第23號為例，該期「論議」欄刊載〈關臺灣人之說〉<sup>34</sup>，是那珂通世博士來台遊覽後的訪談，文中那珂除針對台灣的種族、歷史與風俗提出見解外，還特別宣揚剪辮髮、解纏足等總督府官方政策；「學術」欄刊載〈法制經濟大意〉<sup>35</sup>與〈教育

30 同註29。

31 自明治36年（1903）8月，17號起改為「論議」。明治45年（1912）3月，119號後又改回「論說」，並沿用至終刊。

32 「文藝」、「史傳」兩欄，《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創刊時統稱為「文藝史傳」，至明治37年（1904）9月，30號後，分列為「文藝」、「史傳」兩欄。

33 「雜錄」部分標題混用「雜報」一詞，但數量不多，絕大部分使用「雜錄」一詞。

34 那珂通世口述，三屋大五郎譯，〈關臺灣人之說〉，《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3號（1904.02.25），頁1-8。

35 添田壽一著，南巢生（初山衣洲）譯，〈法制經濟大意〉，《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3號，頁8-10。

學》<sup>36</sup>兩篇連載文章，前者介紹國家主義、國務範圍與政體類別，後者則是一篇教學現場的教案範例；而「實驗調查」則刊載〈漢文教授上雜感〉<sup>37</sup>，是篇關於國語教學方法的課堂實踐報告。透過這些文章，可以察覺其中政令宣導與新知識的傳播，是這個區塊的核心。

第二個區塊，則包含「文藝」、「史傳」、「雜錄」三個欄位，內容以刊載漢詩文、歷史傳記、文學評論或文壇資訊等等。以《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第30號為例，「文藝」欄中收錄〈澶淵之役寇準以宋王為孤注論〉<sup>38</sup>、〈養蠶百絕·錄六〉<sup>39</sup>、〈圓山八景〉<sup>40</sup>、〈讀日本外史詠諸名臣〉<sup>41</sup>等漢詩文作品，「史傳」欄則有屬於傳記的〈林友直傳〉<sup>42</sup>，與屬於歷史範疇的〈戴案紀略〉<sup>43</sup>。「雜錄」欄另收錄演講稿〈支那人對日本之思維〉<sup>44</sup>，以及屬於文學批評的〈宋張戒歲寒堂詩話〉<sup>45</sup>。

第三個區塊，包含「內外彙報」、「會報」兩個專欄。「內外彙報」欄大多收錄台島各地的教育訊息，諸如教員調動、學校招生等消息，偶爾也會登載世界重要時事，內容多元駁雜，多為具有時效性的瑣碎消息。而「會報」欄，則專門登載臺灣教育會的消息，諸如會議、演講活動等消息，會員增減異動，乃至於會規章程的公告等。

在介紹過《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大致內容之後，下文將集中在「台日漢文交流之樣態與多重意涵」與「現代性啟蒙知識的導入及其駁雜性」兩大主軸進行討論，前者分成三點討論：「漢詩文知識傳播交流及資料

36 渡邊教授口述，黃贊鈞譯，〈教育學〉，《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3號，頁10-14。

37 流客命，〈漢文教授上雜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3號，頁14-16。

38 許子文，〈澶淵之役寇準以宋王為孤注論〉，《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0號，頁10-11。

39 小島慎齋，〈養蠶百絕·錄六〉，《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0號，頁11。

40 莊鶴如、潘濟堂，〈圓山八景〉，《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0號，頁11-12。

41 謝汝詮，〈讀日本外史詠諸名臣〉，《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0號，頁12。

42 館森鴻，〈林友直傳〉，《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0號，頁13-15。

43 吳德功編，三子恒（三屋大五郎）校，〈戴案紀略〉，《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0號，頁15-17。

44 市村讚次郎演說，謝汝詮譯，〈支那人對日本之思維〉，《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0號，頁17-20。

45 清陰逸人（三屋大五郎）評訂，〈宋張戒歲寒堂詩話〉，《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0號，頁20-22。

來源」、「從籠絡同化到尋求文學知音」、「在台日人展示漢文造詣及其意圖」，後者則分別從以下三個面向進行分析：「殖民現代性的導入」、「所謂『除三害、興三利』」、「梁啟超〈禁早婚議〉被抄襲挪用的複雜意涵」。

#### 四、台日漢文交流之樣態與多重意涵

前文提到室屋麻梨子、張瑜庭等人關於《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先行研究，對日本如何以漢學為工具，透過教育與傳播的方式進行達到對台灣同化的目標，論之已詳。而陳培豐則專注於「殖民地漢文」概念的闡述發明，強調該刊對引進現代啟蒙知識的貢獻。以上三人的研究，室屋麻梨與陳培豐並未涉及漢詩文作品及知識的討論，張瑜庭曾舉魏清德、吳德功、三屋清陰、中村櫻溪等人為例，分析該刊台日文人漢詩文發表、交流樣態，並討論該刊刊載來自中國與日本的詩話與文話。本文將在張瑜庭的研究基礎上，分別從以下三個角度，提出更具體深入的研究發現，從而彰顯這種漢文交流的豐富意涵。

##### （一）漢詩文知識傳播交流及資料來源

經筆者統計，1903-1907年三屋大五郎擔任主編期間，《臺灣教育會雜誌》曾刊載中國詩話共計14種，另有日本漢詩文家介紹及文話3種。中國詩話方面，包括〈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詩例〉、〈東坡詩話拔抄〉、〈唐釋皎然詩式〉、宋蘇轍撰述〈詩病五事〉、宋嚴羽〈詩辯〉、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話〉、清李沂〈秋星閣詩話〉、宋陸游〈放翁詩話抄〉、清袁枚〈續詩品〉、宋張戒〈歲寒堂詩話〉、〈誠齋詩話鈔〉、〈唐子西文錄〉、〈徐而庵詩話抄〉、〈龍江詩話〉。至於日本漢詩文家介紹及文話，則有〈近世詩人小傳〉、〈拙堂文話評〉、〈本朝文苑故事〉。這些文章由於長短有別，或數期連載，或單期刊出，總數相當龐大，可見除了傳播現代啟蒙知識，台、日雙方漢文知識的交流傳播，也是該刊創立初期的側重點。而上述作品雖然有的註明「清陰校訂」、有的分別署名「清陰逸人」、「三子恒」、「東門小史」等，但內容其實都屬於轉載性質，詳如附表。

針對這些中國詩話的密集刊登，張瑜庭曾指出：這說明當時人對漢詩作

品的需要、渴求與重視，也擴大了台灣人的知識範圍。<sup>46</sup>所論甚是，尤其台灣在清朝統治時期缺少現代化的印刷技術，書籍流通並不普及，而日本統治台灣之後，透過報紙雜誌快速即時的傳播特性，成為知識流通普及最重要的新興媒介。然而，張瑜庭認為這些詩話來自中國，似乎只說對一半。經筆者追查發現：這些中國詩話，除〈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詩例〉、〈龍江詩話〉兩篇另有其他來源（詳見下文）之外，其他有八種可確定是由日本儒學者與漢詩人近藤元粹所編的《螢雪軒叢書》中轉載而來，<sup>47</sup>詳見以下對照一覽表：

表1 《臺灣教育會雜誌》轉載近藤元粹評定《螢雪軒叢書》中國詩話一覽表

篇名	《臺灣教育會雜誌》卷期	原刊篇名	原刊種類
東坡詩話拔抄	第14號，1903.05.25	東坡詩話	螢雪軒叢書·第33種
唐釋皎然詩式	第15號，1903.06.25 第16號，1903.07.25	詩式	螢雪軒叢書·第2種
宋蘇轍撰述詩病五事	第17號，1903.08.25	詩病五事	螢雪軒叢書·第36種
白石道人詩話	第19號，1903.10.25	白石道人詩	螢雪軒叢書·第52種
秋星閣詩話	第20號，1903.11.25	秋星閣詩話	螢雪軒叢書·第13種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	第30號，1904.09.25	寒堂詩話	螢雪軒叢書·第44種
唐子西文錄	第48號，1906.03.25	唐子西文	螢雪軒叢書·第9種
徐而庵詩話抄	第51號，1906.06.25 第55號，1906.10.25 第56號，1906.11.25 第57號，1906.12.25	徐而庵詩話	螢雪軒叢書·第32種

推論證據如下：其一，《徐而庵詩話》作者為清初時人徐增，王英志曾詳細考證該書之由來：

徐增有《說唐詩》二十二卷，卷首為《與同學論詩之語》，後為張潮改

46 張瑜庭，〈日本與台灣漢學連結：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11）研究〉，頁59。

47 近藤元粹（嘉永3年～大正11年，1850-1922），名元粹，字純叔，以南洲、螢雪軒為號，日本愛媛縣松山市人，兼擅詩文書畫，為明治時期著名的儒學者與漢詩人。明治25年（1892），出版《螢雪軒叢書》十卷，收錄中國歷代詩集、詩話59種，並對自身喜好的作家詩集詳加評點，出版之後廣為流傳，與《螢雪軒論叢書》六卷，同為其代表性著作。

名為《而庵詩話》收入《昭代叢書》，但有刪除或遺漏，丁福保《清詩話》即收此書。日人近藤元粹編《螢雪軒叢書》却據《與同學論詩之語》原文收入，內容完璧充缺，並略作評點，改名為《徐而庵詩話》。<sup>48</sup>

換句話說，《徐而庵詩話》的書名，其實是由近藤元粹所改定，可見《臺灣教育會雜誌》刊登的〈徐而庵詩話抄〉，是從近藤元粹《螢雪軒叢書》選錄轉載。其二，「東坡詩話」並非蘇軾自撰，而是後人雜抄蘇軾文章中談及詩的片段編成，至遲在南宋已成書。<sup>49</sup>現存僅有《說郛》本，流通不廣，近藤元粹根據此一版本輯入《螢雪軒叢書》，而三屋清陰又根據《螢雪軒叢書》所收，摘錄片段刊登在《臺灣教育會雜誌》。其三，既然《螢雪軒叢書》收錄的中國詩話，常被三屋轉載，上表中的另外六種詩話可能也是從這套叢書摘選而來，推論應屬合理可信。

另一種來源，則是日本的漢詩文雜誌。《臺灣教育會雜誌》所刊載的中國詩話，另有〈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詩例〉一篇，筆者推測本篇與介紹日本漢文學家的〈近世詩人小傳〉、〈本朝文苑故事〉，及兩位日本家討論漢語古文作法的〈拙堂文話評〉，共計四種，應該都是從明治時期日本漢詩文雜誌《作詩作文之友》轉載而來，詳見以下對照表。<sup>50</sup>

48 王英志，〈《徐而庵詩話》精義發微〉，《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期（1983.12），頁51。

49 《郡齋讀書志》小說類稱「東坡詩話」的由來是：「蘇軾書有及詩者，好事者因集成二卷」。

50 日本明治時期發行的漢詩文雜誌《作詩作文之友》，簡介如下：該刊於明治29年（1896）10月由益友社創辦，明治31年（1898）1月改題為「文章」，11月再改題為「作詩作文之友」，針對改題的理由，「作詩作文之友」第一輯所載的社告指出，以往針對在「作文之友」與「文章」之中，對於文章的作法已多所著墨，如今希望闡發作文與作詩的方法，藉以提高少年子弟的品行。這份雜誌以刊載岩溪裳川與森春濤作品為核心，並兼及日本知名漢學者之作品，如山陽、藤田東湖、依田學海、重野成齋、安井息軒等等，是一本具有高度史料價值的明治時期漢學刊物。參見「かんがくかんかく（漢學感覺）」網頁（來源：<http://ameblo.jp/k2600nen/entry-10181152770.html>，2013.09.12檢索）。又，參見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收錄社揆一〈明治詩壇展望〉一文對《作詩作文之友》之介紹（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83），頁374。

表2 《臺灣教育會雜誌》轉載《作詩作文之友》文章一覽表

篇名	卷期	原刊篇名	原刊卷期	原刊作者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詩例	第11號，1903.02.25 第12號，1903.03.25 第13號，1903.04.25	二十四詩品舉例	第5號，1899.01.25	岩溪裳川
近世詩人小傳 (日本)	第22號，1904.01.25	近世詩人小傳	第1號，1898.11.25 第2號，1898.12.25	無署名
拙堂文話評 <sup>51</sup>	第22號，1904.01.25 第23號，1904.02.25 第24號，1904.03.25 第25號，1904.04.25 第26號，1904.05.25	拙堂文話評	第3號，1898.12.25 第6號，1899.02.10 第8號，1899.02.10 第10號，1899.04.10 第13號，1899.06.10 第17號，1899.09.25 第18號，1899.10.25	齋藤拙堂 著、山木 眉山評
本朝文苑故事 (日本)	第28號，1904.07.25	本朝文苑故實本 朝文苑故事	第1號，1898.11.25 第14號，1899.06.25	無署名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詩例〉，是根據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每一品舉出兩首唐詩作為例證，以供讀者玩味理解。如第一品「雄渾」，原文之後舉的詩例是岑參〈封大夫破播仙凱歌〉、汪遵〈長城〉，第二品「沖淡」，舉的詩例是李白〈秋下荊門〉與薛能〈老圃堂城〉等。<sup>52</sup>而早在明治32年（1899），《作詩作文之友》就曾刊出岩溪裳川的〈二十四詩品舉例〉，筆者目前尚未能取得《作詩作文之友》原刊，無法進行比對，<sup>53</sup>但恰巧《臺灣教育會雜誌》在明治37年（1904）（第22-28號）所載的〈近世詩人小傳〉、〈拙堂文話評〉、〈本朝文苑故事〉都在1898-1899年間刊登於《作詩作文之友》，可見《臺灣教育會雜誌》所刊登的以上各篇，極有可能都是從《作詩作文之友》轉載而來。

51 張瑜庭，〈日本與台灣漢學連結：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11）研究〉，頁60-64曾引述不少〈拙堂文話評〉的內容進行討論，但他卻誤作〈拙堂文話〉。

52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1號（1903.02.25），頁12。

53 三屋清陰在刊出袁枚《續詩品》時，曾正文之前提及：「唐司空表聖之詩品，為古今詞人所愛，余嘗唐詩——選例，揭載之於本誌矣。又茲校訂清隨園袁枚續詩品，以充本誌雜錄。」（《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7號（1904.06.25），頁13。）言下之意，似乎所選詩例乃出自其一人之手。但觀諸他曾直接抄錄梁啟超文章〈禁早婚議〉，卻標自己名號的前例（詳見下文）來看，三屋所舉的詩例，也有可能是直接抄自岩溪裳川。

比較特殊的是〈龍江詩話〉，《臺灣教育會雜誌》曾選刊18則，分兩次刊登，三屋清陰曾清楚交代是由台灣本土文人吳德功（立軒）提供給他：

晉江蔡德輝醒甫，博覽多通，尤長詩才，宦遊臺郡，十餘年矣。東寧學士受其教者頗多，彰邑吳立軒，亦嘗從學焉。頃立軒示余蔡先生所著《龍江詩話》，余讀之，妙作佳吟滿秩（帙），雅趣不可言，因援抄之，以分示同好。清陰逸人。<sup>54</sup>

綜合上述，《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在1903-1907年間，即三屋大五郎擔任主編期間，曾大量刊載中國歷代詩話及日本文話、日本漢文家故事等，這些訊息透露了豐富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就漢詩文知識引介的角度觀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曾在日治初期的台灣，扮演重要的漢學傳播媒介角色，台灣在清領時期由於讀書識字人口極少，以及印刷技術的限制，書籍取得不易。日本領台以後，基於統治之實際需要，創辦不少報紙雜誌，對打開台灣人的知識視野，產生立即性的衝擊，使報刊雜誌成為重要的知識來源。而日本當局為了便於溝通宣傳，曾藉助漢字為工具，與台人進行中國與日本的詩文話交流，並向台灣人介紹日本漢文學家。值得玩味的是：台灣人透過該刊物閱讀中國詩話，其來源乃是日本學者從日本的漢學書籍雜誌中摘選，「轉口」引入台灣。而筆者也從其他史料發現，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常透過日本的書店購買中國古籍。<sup>55</sup>可見當時中國古典漢學書籍在台灣的傳播，除了直接向中國訂購，透過日本引入也是另一種通行的管道。另外，該刊向台人介紹日本漢文學家的生平，並與台人分享日人對漢文寫作的知識見解，當然也能收到多方面的效果，包括以對漢文的共同熟悉感為基

54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66號（1907.09.25），頁16。

55 筆者長期研究台灣著名詩社櫟社，曾翻閱櫟社社長傅錫祺的日記，發現他常向中國、日本各大書店，訂購中國古籍與現代新學書刊，單以大阪高山堂（明治、大正時期的著名書店，兼營出版）為例，如1907年4月21日：「發信往大阪市東區心齋橋筋博勞町角青木高山堂，為葉引昌君代買事類統編壹部、陸放翁詩鈔壹部、白樂天詩集貳部（自己要買壹部）。」同年5月24日：「發信為謝先生、袁炳修、劉禎祥等往高山堂，購買陸放翁詩鈔一部、白樂天詩集三部。」1909年2月15日：「發信往高山堂，購莊子及楚辭各一付。」1917年3月22日，他更大手筆花了拾壹圓貳拾錢（當時他的月薪約30圓），向大阪高山堂購買《史記評林》50巨冊。

礎，拉近情感距離，交流實際寫作經驗，進而認識日本漢學傳統及日本漢文學家等。

## （二）詩文交流的雙面性：從籠絡同化到尋求文學知音

上述引介日本漢文學家或文話對漢文寫作方法的討論，目的是為了促進台灣人對日本漢文學的認識，從而遂行同化的最終目標。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漢學為橋樑與台灣文人進行交流，因為共同的興趣而拉近彼此的距離，其中透過作品的相互品評，就是一種常見的互動模式。該刊常在作品之後附上評語，品評者除了日籍編者三屋清陰、初山衣洲、中村忠誠之外，也有台灣人。其目的無可避免有籠絡台人的目的，但其前提則必須建立在彼此可以交流共感、無所扞格的「文化氛圍」中，也就是彼此共有的漢詩文傳統。如初山衣洲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發表舊作〈移居雜詠〉七絕十首，其後附有李種玉、三屋清陰兩人的評語。台人李種玉<sup>56</sup>評語如下：

清新勝庾，俊逸邁鮑，寫景寫情，俱見聲韻鏗鏘，卓爾不凡。杜工部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斯語可以移贈。<sup>57</sup>

所謂「清新勝庾，俊逸邁鮑」，是援用杜甫〈春日憶李白〉詩句：「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李種玉將杜詩的譬喻法改為比較法，認為衣洲詩的清新俊逸風格，還超過庾信、鮑照。隨後再度套用杜詩〈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稱讚他有仙骨。這段品評對衣洲推崇甚高，其言究竟是出自真誠的推重或是客套的諛詞，實難以判定，但套用的詩句與典故，都是彼此熟悉的。

56 引述「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如下：「李種玉（1856-1942），台北三重埔人。光緒17年（1891）參加台北府試，取進縣學；20年（1894）列選為優貢生。日本治台後，於明治28年（1895）出任保良局幫辦事務囑託，明治30年（1897）總督府佩授紳章，並被推舉為三重埔保良局局長。明治33年（1900）入國語學校擔任教務囑託，教授漢文、習字，提攜學子甚眾。曾與謝雪漁茂才代表台灣儒士，赴日本參列湯島聖堂孔子大祭；又與林清敦等創設「『鷺州吟社』」。李氏精書善文，台北寺廟楹聯，有不少出自其手。」。參見「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來源：<http://xdcm.nmtl.gov.tw/twp/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828>，2008.11.17）。

57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2號（1904.01.25），頁11。

然則有些作品及其評點，則顯示台灣人政治認同已被日人同化的思維，如李漢如曾在該刊發表〈日本男兒行（三月初三讀新聞有感）〉，詩旨是歌詠日本軍人在日俄戰爭中的英勇表現，開頭以「日本真男兒，慣作沙場客」破題，最後以「真成日本好男兒，海外聞之皆嘆息」收尾，詩後有中村櫻溪四字簡評：「語語壯絕」。<sup>58</sup>而當時就讀於國語學校，年齡才20歲的魏清德也曾發表〈皇師陷旅順歌〉，詠讚日俄戰爭中日本軍隊攻陷旅順。<sup>59</sup>更明顯的例子，又如謝汝銓〈讀日本外史詠諸名臣〉，在該刊第29、30期發表14首詠日本名臣的詠史詩，該刊漢文主編三屋清陰在作品後加上評語：

昔王仁以韓人為我帝師，善國歌，今謝秀才以新國民以詠我古忠臣。亦抑王仁之匹儔也。<sup>60</sup>

這段評語中的王仁，是傳說中將漢字與儒教傳到日本的古代韓國人，<sup>61</sup>所謂「以韓人為我帝師，善國歌」，只是日本古籍所載的傳說，並非信史。三屋清陰將謝汝銓與王仁類比，但謝以歌詠日本忠臣表達對日本的認同，王仁卻是傳播漢文化到日本，三屋所言似乎刻意泯除王、謝對日本所隱含的位階差異，只著眼於兩人都扮演異族間的溝通角色，藉此以同化台人之意圖不言可喻。

然而，除了籠絡與同化的政治目的，吾人亦不可忽略這種以漢文品評而締交的互動模式，也可能產生深刻的情誼。彰化士紳吳德功與《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主編三屋清陰、中村櫻溪三人之間的往來互動，便是一特殊例證，以下即就此加以分析。

吳德功與三屋清陰的結交，源於明治32年（1899），當時台中師範學校創設，兩人同為該校教員，因而結識。三屋大五郎曾在〈戴案紀略序〉中，記錄

58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4號（1904.03.25），頁9。又根據該報25號〈國語校卒業式〉所發佈之訊息，可知李漢如是國語學校「國語部」1904年畢業生。

59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43號（1905.01.25），頁11。魏清德生於1886年，1903年入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就讀。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柒·文獻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12），頁268。

60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9號（1904.08.25），頁14。

61 王仁（韓文：왕인），傳說應神天皇在位時，從百濟前往日本傳達漢字和儒教的人物，但其真實性受到學者質疑。《日本書紀》上的寫法是王仁，《古事記》則寫成和邇吉師。

當時的狀況：

明治己亥歲，我總督府，設臺中師範學校于彰化，余亦補任教授，授本島歷史，先生於漢文，素所專長，博覽洽通，綽然有餘，余於歷史，雖頗諳究，然非所專，至本島史乘，尤罕寓目，常恐此科無可資用者（中略）。余心苦之，謀諸先生，先生曰：「曩者余嘗承劉巡撫之命，採訪臺灣府志軼事。」乃出示《戴案紀略》三卷。批閱之，喜其採緝周密，事實精確，而篇中敘事書法，悉合綱目體裁，余不覺嘆曰：「果哉，先生之長於史才也」。余獲此篇，於教授禪補不貲，固先生之賜也。<sup>62</sup>

文中指出，三屋在台中師範學校負責教授歷史，卻苦無台灣史的參考資料，於是向吳德功請益，吳德功提供自己所著的《戴案紀略》三卷做為參考，三屋對吳德功的史才讚嘆不已，將《戴案紀略》引為教材，兩人也因此結下翰墨因緣。

明治35年（1902）3月，三屋調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並投入《臺灣教育會雜誌》的編輯行列。三屋將吳德功所著的《施案紀略》譯為日文，以〈施九緞騷亂紀畧〉<sup>63</sup>為題發表，在明治35年（1902）10～11月，連載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第7、8號上，而第8號同時還刊載一首三屋的詩作〈寄吳立軒〉：

友誼千金重，新知似舊知。論心期濟世，撫景嘆平時。

海闊歸鴻遠，山遙落日遲。別來多感慨，何處寄相思。<sup>64</sup>

至於吳德功的回贈之作，則刊載於次年3月，題為〈接清陰先生詩章，有天末懷人之感，爰吟五律敬步原韻，以表渴懷〉，內容如下：

62 三屋清陰，〈戴案記略序〉，《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55號（1906.10.25），頁12-13。

63 吳德功著，三屋大五郎日譯，〈施九緞騷亂紀畧〉，《臺灣教育會雜誌》7號（1902.10.25），頁60-65、8號（1902.11.25），頁32-39。

64 三屋大五郎，〈寄吳立軒〉，《臺灣教育會雜誌》8號，頁31。

歲序遷移急，天涯懷故知。索居憐此日，促膝憶當時。

鳶站<sup>65</sup>行迴遠，魚書往復遲。暮雲春樹際，徒倚靜懷思。<sup>66</sup>

此詩刊登時，並附有三屋清陰的回應語：「一讀黯然，不堪懷舊之情」，見證三屋與吳德功兩人建立互動的基礎，源於知識的交流與敬重，可以說是透過了漢文書寫，連結了日台文人間的情誼。

此後，三屋更向吳德功索取《戴案紀略》，逐期連載於《漢文報》上，並希望吳德功能將此書刊行流傳於世。<sup>67</sup>《戴案紀略》在《漢文報》總共連載了12期，雖然沒有刊完全書內容，但這是台灣人的作品，第一次長期登載於這份以日人編輯群為核心的漢文刊物上，可以說是日台漢文交流的一個重要案例，而促成這次交流的要素，即是日台文人間，透過漢文建構起來的筆墨情誼。

除了三屋清陰外，《漢文報》另一個重要編輯中村櫻溪，也與吳德功保持著深厚的交情，甚至延續到中村離台多年以後。吳德功與中村櫻溪，曾分別在《漢文報》上提到彼此結識的過程，吳德功在〈讀中村伯實涉濤集書後〉中寫道：

曩者余在台中師範學校供職，適先生奉命巡學，校長設筵宴會，一投名刺，如舊相識，第音語不通，爰在筵中作筆談，互相酬答，至筵撤猶依依不忍離。<sup>68</sup>

吳德功記錄自己在台中師範學校任職時與中村相識，由於該校於明治32年（1899）創設，至明治35年（1902）3月廢校，故知吳德功與中村初識的時間，大抵在1899年至1902年之間，與吳與三屋相識的時間相近。值得注意的

65 原文作「站」，疑為「跣」之誤字。

66 吳德功，〈接清陰先生詩章，有天末懷人之感，爰吟五律敬步原韻，以表渴懷〉，《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2號（1903.03.25），頁9。

67 三屋清陰，〈戴案記略序〉：「今茲余供役於國覺，公務之餘，編教育會雜誌，乃請先生，每號載此書一段，然原冊紙數甚多，非數號雜誌之所能盡，余因與先生謀，印行全冊，以公諸世」。同註62，頁13。

68 吳德功，〈讀中村伯實涉濤集題書後〉，《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4號（1905.01.25），頁8。

是，吳與中村是透過筆談進行交流，這是漢文作為日台溝通橋樑的明證。

關於兩人的結交與互動，中村櫻溪〈戴案紀略序〉一文留有以下紀錄：

先生彰望族，加以學問文章，資德俱崇。余嘗以公事抵彰，時先生為師範校教師，會醜筆語，心情相識。後余寄拙著乞教，先生乃被贈以文，仔細論評。其推稱處，雖不敢當，神合默契，竊推為臺疆一知己。頃者先生將以此編付刻，价三屋子恒徵弁言。嗚呼！余既辱先生之知，又被榮拙著，此書之出，余亦得因以傳名，則烏得不為言，於是乎序。<sup>69</sup>

中村除紀錄兩人在宴席上筆談結交之事，還一併記錄了兩人後續互動的狀況，即中村將著作《涉濤集》寄給吳德功品評，而吳德功回贈序文大力推贊，兩人透過漢詩文締交往來，中村甚至還推許吳德功是其在台灣的知己，後來吳德功出版《戴案紀略》，換他請中村寫序，彼此交情之密切，可見一斑。

中村櫻溪曾將其在台作品，彙編為《涉濤集》、《涉濤續集》與《涉濤三集》，而吳德功也分別為《涉濤集》和《涉濤三集》寫了三篇序文，分別是〈讀中村伯實涉濤集題書後〉<sup>70</sup>、〈再讀涉濤集書後〉<sup>71</sup>及〈三跋中村櫻溪涉濤三集〉<sup>72</sup>，前兩篇為《涉濤集》而寫，先刊載發表於《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後收入吳德功《瑞桃齋文稿》，而〈三跋中村櫻溪涉濤三集〉則僅收錄於《瑞桃齋文稿》，因為《涉濤三集》在中村離台返日的隔年才出版，所以吳德功未再將稿件發表於《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上。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41年（1908）《涉濤三集》出版時，中村已離開台灣，而吳德功能作〈三跋中村櫻溪涉濤三集〉，表示中村特意由日本寄作品集給吳德功，顯示出兩人的友誼，並未隨著中村離台而斷絕。同樣的，在吳德功《瑞桃齋文稿》上，我們也可看到中村櫻溪所寫的序文，以及各篇文章後面的

69 中村櫻溪，〈戴案紀略序〉，《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54號（1906.07.25），頁13。

70 同註68。

71 吳德功，〈再讀涉濤集書後〉，《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5號（1905.02.25），頁9-10。

72 吳德功，〈三跋中村櫻溪涉濤三集〉，《瑞桃齋文稿·上卷》（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05），頁121-123。

閱讀評語。由於中村的序文，載明撰寫時間為大正6年（1917），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兩人雖然實際見面時間有限，卻因漢文交流而惺惺相惜，締結了跨越時空阻隔、恆久不變的文學友誼。

回過頭來說，由於三屋清陰與中村櫻溪，皆是《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編輯，因此這份刊物也成為三屋、中村與吳德功三人之間文學互動的平臺。諸如三屋〈寄吳立軒〉詩後，中村評語：「後聯無限妙致」，而吳德功〈讀中村伯實涉濤集題書後〉文後，三屋則評曰：

自論入評，自評入感，敘次簡老，波瀾動宕，中段評涉濤集處，溫雅適實，尤中肯綮，非深讀此集者，恐無此言。夫櫻溪先生東京名流，立軒先生中臺泰斗，意氣投合，神識相照，抑亦可謂奇遇矣。<sup>73</sup>

三屋的評語，前半賞析吳德功文章，強調他必定是深入研讀《涉濤集》，才有如此深刻的評論。後半推許中村與吳德功意氣相投，並認為日台文人出身地迥異，卻能夠如此融洽交流，可以說是一場文壇奇遇。

吳德功接續發表〈再讀涉濤集書後〉一文，也顯示三人間進一步的文學交流。文中，吳德功特別針對中村櫻溪的山水遊記，加以品題：

予又羨先生年過五旬，尚能健步，登觀音、大屯諸山絕頂，搜奇探幽，見夫礪烟之變幻無常，海波之浩淼靡涯，故其為文也，離合操縱，亦無窮變幻，推波助瀾，亦涯涘莫測，抑揚頓挫，亦如山之蜿蜒起伏。是臺北諸名山，得先生之文而彌傳彌廣，先生之文，亦藉此山而愈出愈奇，相得並彰，是此山之幸耶，抑亦先生之幸也。<sup>74</sup>

吳德功在文章中，認為台北盆地的群山勝景與中村的文字相互輝映，對中村的古典漢文作品給予高度評價，而三屋、中村亦分別附上評語於此文之末：

73 同註68。

74 同註71，頁10。後改題〈再讀中村櫻溪先生涉濤集書後〉，吳德功，《瑞桃齋文稿·上卷》，頁117-119。

三屋清陰曰：「造物好示奇於天地，與文人之所以用其奇，俱非世人之所知者。立軒先生胸中丘壑、筆底煙霞，身雖不富濟勝之具，櫻溪先生之用奇，與造物之示奇，俱盡之，洵非偶然也。」

中村櫻溪曰：「先生辱讀拙著，賜以文二道，前則每題品評，後則稱能跋涉山川，一一中肯綮，善發揮愚志之所存，竊以為南瀛一知己。昔人云：天下獲一知己則足矣。今得先生一言，則拙著之重，豈祇鼎呂，但稱揚太甚過，愚不敢當已」。<sup>75</sup>

三屋認為吳德功文學造詣深厚，雖然無法像中村一樣親歷勝景，卻能透過文筆，彰顯中村文字與山水相輝映的特質。而中村則感謝吳德功閱讀並品評其著作，認為吳德功的評述，能契合自己的心志，是其在台灣有幸結識的文學知己，感激知遇之情溢於言表。

透過這些互評的記述，不難體會到三人之間的文學情誼，這樣的日台漢文交流，根源於彼此對於文學的愛好，文人間的相惜與知交，在某種程度上，是跨越國族差異的存在，縱使《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具有強烈的政策傾向，也不宜將日台漢文人間的文學互動，粗率且慣性的一律劃歸為攏絡與收編，應該考量其中的個案差異，始能做出適切的評價。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漢文學家在明治維新以後逐漸失勢，而台灣這片新附的殖民地，提供這批來台日人發揮的舞臺，他們在台灣所創作的漢詩文作品也有機會在台灣出版，尋求知音之意圖不言可喻，如明治37年（1904）6月發行的該刊，曾發佈〈刊行著書〉訊息如下：

近時刊行書，汗牛充棟，而漢文書冊，寥寥如晨星。中村櫻溪子《涉濤集》既經刊行，館森袖海著《先正傳》此次刊行，衣洲子亦有《臺灣風俗詩》之著，不日將刊行。《涉濤集》在台北石坊街並木書店，《先正

---

75 同註71，頁10。

傳》係《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sup>76</sup>

中村櫻溪《涉濤集》出版於明治36年（1903），館森鴻（袖海）的《先正傳》則是明治37年（1904）7月出版。至於初山衣洲的《臺灣風俗詩》則可能因他已於明治37年（1904）返回日本，後來並未出版。<sup>77</sup> 這些著作出版訊息或預告，不但顯示他們優秀的漢文造詣，也透露出尋求更多台灣讀者的意圖。所謂「漢文書冊，寥寥如晨星」的感慨，其目的可能是以漢文為媒介，企圖喚起台人相濡以沫的「漢文想像共同體」意識。

### （三）在台日人展示漢文造詣及其意圖

#### 1. 展示傑出的漢文寫作技藝

日治初期來台之高級官僚與教師，一般都具有漢學素養。論漢詩文造詣之高，明治37年（1904）2月，同時應邀兼任《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編輯的中村櫻溪（1852-1921）與初山衣洲（1855-1919）兩人，尤其是在台日本漢文學家中的翹楚。<sup>78</sup> 他們擔任編輯後，常態性工作推測應該是協助漢文作品的選稿，進行點評，並常發表他們自己的漢詩文作品。日人漢文編輯，透過漢詩文的選刊、品評，與個人作品的示範性展示，在《臺灣日日新報》之外，形成另一個漢文交流的平臺。

1903-1908年間，中村櫻溪在台灣曾出版三本文集《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三書，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曾刊登於《臺灣教育會雜誌》。

76 〈刊行著書〉，《臺灣教育會雜誌》27號（1904.06.25），頁18。

77 初山衣洲《臺灣風俗詩》數種手稿版本，目前珍藏於大阪中之島圖書館，白佳琳、黃美娥與蕭明惠都有專文討論。關於三人生平及作品之導讀介紹，詳參見廖振富、張明權合編，《在台日人漢詩文集》（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11），頁23-29、頁129-136、頁207-213。

78 《臺灣教育會雜誌》23號（1904.02.25），頁24。標題及內容如下：「中村、初山兩委員：此次櫻溪中村忠誠君、衣洲初山逸也君，並承本會長之囑，為編輯委員，邇後多執筆於漢文報。兩君博學鴻詞，世所共知，吾儕深喜本會得良委員也。」中村櫻溪從1899年到1907年，在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擔任教授，1907年去職，離台返日，兼任《臺灣教育會雜誌》編輯約有三年多，故在該刊發表作品甚多。初山衣洲從1898年12月起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編，1903年4月因故卸任，7月進入臺灣總督府總務局學務課，參與舊慣調查和臺灣府志翻譯工作。1904年2月，開始兼任《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編輯，但為時甚短，4月即去職離台。

前文提及：吳德功與中村櫻溪的深厚交情，就是建立在對漢語古文的共同熱愛之上。其中關鍵正在於中村透過自己寫的作品，充分證明其秀異的書寫能力，以及對於中國古典漢文傳統的精熟。筆者曾有專文討論中村櫻溪的北台灣山水遊記，影響其漢語古文最深的名家，包括柳宗元、韓愈、蘇東坡。台灣學界相關討論頗多，本文不擬贅述。<sup>79</sup>

以下試以《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所刊載的初山衣洲古文〈催詩會記〉為例，觀察衣洲漢文造詣及內涵，全文內容如下：

余羈寓南菜園，鉛槧之暇，嘗與同志諸子，講究唐詩，每月二次，趨期而集，自春逮秋，未曾少倦廢焉。而相會之日，天必雨，或霏霽無聲，或颯然如急霰，或簷溜斷續如聞幽琴韻；或前山暝<sup>80</sup>合，雨腳未及郭，忽渡夕陽放紅。凡每雨一至，風景必為一變，眾稱奇不已。余曰：「老杜詩有之『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東坡亦云『白雨催詩颯颯來』，豈非此時光景邪？」乃名會曰催詩。

夫詩本於性情，漢魏六朝唐宋，以及金元明清諸家，淵源雖同，而性情各異。詩有今古，人有窮達，古人與今人，窮者與達者，其感于中而發于言者，固不能無異同也。昔宋鄭少谷好讀少陵詩，刻意模倣。有誚之者曰：「時非天寶，官非拾遺，徒托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呻嗷矣。」故余嘗以謂：詩可學古人，然能出自變化，而不離其法度，是之謂善學詩而已。

顧余天下之拙者也，何以謂善學詩？惟遭際明時，不耕不販，優游卒歲，日與同志以詩相磨勵。對夫微雨霏霽，則欲其詩之穩且潤；當驟雨颯至，電奔雷轟，則欲其詩之排宕離合，奇變無窮；值簷溜琤琤，如聞摘琴韻，則欲其詩之瑩然而清，窅然而深；至觀浮雲聚散夕陽隱見之狀，則欲其詩之沖淡幽遠，而物理俱全。苟耳目所觸，念念若是，則當

79 廖振富，〈中村櫻溪北臺灣山水遊記的心境映現與創作美學〉，朱岐祥、許建崑主編，《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11.11），頁219-252。

80 原文作「暝」，疑為「暝」之誤植。

其下筆時，變化自然，與性情相映發，雖余駑拙，亦不無分毫進境，況年少才銳如諸子者乎！嗟乎天特弄斯技巧，以催諸子詩，兼視變化之理，想果有所望於斯會耶！吾請與諸子勉之。辛丑八月十四日會散，雨未歇，晚涼如水。乃呼燈為之記。

三屋清陰曰：雨字眼目，奇奇變幻，與性情異同相映。結構雅典，照應完密，殊結束加「雨」二字，全篇活動，此法或由節齋氏來耶。<sup>81</sup>

初山衣洲在明治31年（1898）年底來台，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編，由於漢學造詣精湛，受到當時總督兒玉源太郎的賞識，特許他借住於兒玉的私人別邸「南菜園」中。本文寫於辛丑（1900）年，詳述衣洲與當時在台的同好，每月在南菜園中集會兩次，共同切磋詩藝，並套用杜甫與蘇東坡的詩句，將此一定期聚會雅稱為「催詩會」。文後所附該刊主編三屋清陰的評語，完全針對作法、結構點評，其實本文意義當不僅於此。

就內容觀察，本文有幾點意涵值得關注，其一，充分見證日本領台初期，來台日人的漢詩文活動風氣之盛，同好每月兩次集會，專門研究唐詩，未嘗中斷，其熱情可知。其二，對唐宋名家作品之精熟，因台北盆地多雨，集會時都碰巧遇雨，作者便能聯想杜甫、蘇軾詩中都曾提及下雨就是「催詩」的天氣，因而以此兩字為集會名稱，雅致又切題。甚至宋人鄭少谷刻意學杜甫而被譏笑之例，也能信筆拈來，輔助論說。其三，以初山衣洲為例，在台日本漢文名家之漢語古文，不但文采斑斕，鍊句精準，也常見脫胎自中國古代名家的痕跡。<sup>82</sup>

日本來台文人所寫的漢詩文，一再出現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且具有如此優秀水平者並不少見，可以想見台灣讀者對來台日人的漢文造詣，

81 初山衣洲，〈催詩會記〉，《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7號（1903.07.20），頁9。

82 如〈催詩會記〉從「對夫微雨飄飄」以下文句，至「則欲其詩之沖淡幽遠」一句為止，以排比句法闡述個人創作觀，並連用「欲其」句式，似乎脫胎自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品讀之餘必感佩服。而該刊作為促進日台間漢文交流的平臺，其收效也相當明顯。

## 2. 展示漢文知識的深厚廣博

前文曾詳論中村櫻溪與吳德功，如何透過漢文建立的深刻友情，以下更擬透過中村的隨筆短文，看出其漢文學知識的深厚廣博。他曾在該刊陸續撰寫「櫻溪雜筆」專欄，常出現有關漢學文化議題的討論，如以下三例。其一以〈歸養〉為題，回應台人對日人使用漢語詞彙正確性的質疑，內容如下：

初山衣洲去臺留別詩，有「歸養」之語，艁之紳士見而疑衣洲有親而歸養，曰：「養自家病，不謂之歸養也。」臺紳習於近俗，而遺乎古誼，故於東人古文，往往有疑難。按：《後漢·劉愷傳》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歸養。」此「歸養」字，分明自養矣。<sup>83</sup>

本則雜筆提到：初山衣洲離台留別詩有「歸養」一詞，由於台北艁艁地區有仕紳有人認為是衣洲用錯詞，中村櫻溪乃引用《後漢·劉愷傳》，指出「歸養」原本就是指自己「養病」，而不是指奉養父母。他進而評斷說是「臺紳習於近俗，而遺乎古誼。」展現其個人漢學知識之博通，尤勝於台灣人之意味十分明顯。另一篇〈忠孝一致〉，則比較日本與中國對忠孝觀念的差異：

我邦自古重君臣之義，一旦有急，以致身君國為孝，故無「忠孝難兩全」之語。曾子云：「戰陳無勇，非孝也。」此言善教我民矣！寧為失母而破賊之趙苞，不為歸魏而生母之徐庶。其習如此，是所以克疆俄也。<sup>84</sup>

83 中村櫻溪，〈歸養〉，《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7號（1905.04.25），頁16-17。

84 中村櫻溪，〈忠孝一致〉，《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7號，頁17。

所謂日本人「以致身君國為孝」，顯然是以為國家盡忠是最崇高的道德，他認為日本人的忠孝觀，是以對國家盡忠優先，必要時必要時犧牲個人孝道，就是對孝道的轉化擴大，兩者毫無矛盾。文末並將趙苞、徐庶兩人臨難時，是否以保全母親的生命為優先考量兩相比較，推崇趙苞而否定徐庶。他對中國歷史之嫻熟，不言可喻。<sup>85</sup>最後，本文再舉一個更冷門的例子，篇名〈東儒不解俗語〉，是關於漢語俗諺的討論：

物徂徠、伊藤東涯等諸先驅，皆能通官語小說及俚俗之言。近世儒者，唯讀六經史子古文，於俚諺俗語，多不能解。有一巨儒，見書生問「兒郎偉」之義，巨儒漫謂是兒子長大之義也，便以答。後及讀東涯《盍簪錄》，始知其為「許邪」之聲，大愧。近日某博士見清人集中有「魚苗」字，極稱其雅，殊不知呼幼為苗者，乃俗語也。<sup>86</sup>

文中指出伊藤東涯等早期日本儒學者，都能通曉漢語中的俗語，而當代的儒學者卻只熟讀六經史子古文，對俚諺俗語非常陌生。接著舉「兒郎偉」一例，某儒學家不知其意而誤解，後來在伊藤東涯（1670-1736，江戶時期著名儒學家）的《盍簪錄》書中才看到正確答案，深覺慚愧。接著他又舉「魚苗」之例，證明此處的「苗」字，也是俗語的用法。中村上述隨筆，從典雅詞彙到名人故事，到冷僻的俗諺都能清楚理解掌握，目的顯然是在證明其漢語造詣之精深。而如此修養，即使在當時台人中想必也未必多見，台人讀如此文章，或許也會自嘆弗如。

本節主要在集中討論《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日台漢文交流的諸多樣態，與來台日人所展現的細膩手法和豐沛實力，包括漢文知識傳播，資料來源的多重性，而透過漢詩文交流，既可藉此達成籠絡同化的目的，也有可能結為跨越種族的文學知音，而日人更進而以實際作品及漢文知識，證明其精湛造詣

85 趙苞在東漢末年擔任遼西郡太守，帶母親、妻子赴任時，鮮卑人劫持其母親與妻子進犯遼西，威脅他投降，趙苞不從，母親、妻子因而都被鮮卑人殺害，趙苞破敵，安葬母親妻子後，嘔血而死。徐庶與諸葛亮交情甚篤，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後因生母被曹操軍隊所挾持，乃辭別劉備而投靠曹操。

86 中村櫻溪，〈東儒不解俗語〉，《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9號（1905.06.25），頁18。

並不在台人之下。綜合上述，明治時期日本對台灣統治，以漢文為溝通交流工具的現實性、理想性盡在其中，實不宜簡化視之。

## 五、現代性啟蒙知識的導入及其駁雜性

### （一）殖民現代性的導入

臺灣教育會以「臺灣教育之普及及改進」為宗旨，作為該會機關報的《臺灣教育會雜誌》，其編輯內容自然著重於各種新知識的引介、實踐成果與意見交流，而特別針對台灣讀者所設立的《漢文報》，也在既定的宗旨下，以漢文為工具，持續的向台灣讀者傳遞官方政策與時代新知，我們可以將這份刊物，視為殖民現代性導入媒介與管道。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導入現代啟蒙意識的特質，可以由雜誌所登載的文章得到檢證，經由歸納篇章內容，大抵可以觀察出兩個側重類別，分別是「教育與修身」及「推廣科學知識」兩大類，以下分述之。

#### 1. 教育與修身

首先就「教育修身」方面來看，透過教育資訊的傳播與交流，提供教育現場的教師參考，是雜誌創刊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在每一期刊物上，都可以看到與教育相關的文章。由於《漢文報》正式創刊於第10號，以下整理創刊以來十期內的篇章為例，可以清楚看到編輯對於教育修身課題的重視。

表3 《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第10號（漢文報創刊）至20號所載教育修身類篇章

卷號	頁碼	篇名	作者
第10號	頁2-10	漢文教授例	鈴江團吉
第11號 第12號	頁3-8 頁3-5	習字教授法	鈴江團吉
第11號	頁8	伯斯塔羅字氏教育格言	三屋大五郎
第11號	頁9-10	教育之三勢力	東門小史
第12號	頁1-2	論早婚為教育之害	三屋大五郎
第12號	頁5-8	自然之勢力	東門小史
第13號	頁2-4	論道德與實業之關係	三屋大五郎
第13號	頁5-6	技藝教授法	鈴江團吉

第14號	頁2-4	公德論	三屋大五郎
第15號	頁1-3	論忍耐力	三屋大五郎
第16號	頁3-5	社會之勢力	東門小史
第17號	頁6-9	夏時衛生談	愛生山人
第18號	頁1-3	論早婚害於傳種	三屋大五郎
第18號 第20號	頁6-10 頁3-9	公學校算數教授法	加一倍道人
第19號 第20號	頁4-9 頁10-13	教育學	渡邊國語學校教授口述 黃贊鈞譯
第20號	頁1-3	國民教育論	三屋子恒

觀察這十期所刊載的內容，可以將「教育修身」，再細分為三個範疇，第一項是教育理論，如署名東門小史（三屋大五郎）的〈教育之三勢力〉，便指出人類社會與教育進程，都受到「自然」、「社會」與「個人」等三個因素的影響。這篇文章屬於前言性質，而〈自然之勢力〉與〈社會之勢力〉兩篇文章則是後續的正文。這三篇文章討論自然環境與社會結構，對於教育環境與教育成果的影響，可說與〈教育學〉、〈國民教育論〉等篇章，同屬於教育理論的範疇。

第二項是教學技巧，鈴江團吉的〈漢文教授例〉、〈習字教授法〉、〈技藝教授法〉，與加一倍道人的〈公學校算數教授法〉其本質就是教學現場的建議教案，是讓以教職員為核心的讀者群，可以依循參考運用的範例。〈伯斯塔羅字氏教育格言〉則是列舉了20條教學原則，也是屬於教學技巧這一範疇。

第三項則是修身的部分，修身即國民性格的養成，如何將屬於原屬異族的台灣人，同化為日本國民，一直是殖民地台灣最大的教育課題與挑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各式各樣關於國民涵養的文章，如抨擊台人早婚妨礙教育的〈論早婚為教育之害〉、〈論早婚害於傳種〉。〈論道德與實業之關係〉則強調重視道德的讀書人，不應鄙視實業商賈，主張道德與實業，應該相輔相成，才能有益於國家與個人。〈公德論〉論述教育應該培養國民的公德心，認為必須透過教育，讓國民不服從於強力，而服從於公理。〈論忍耐力〉則希望台灣人要有忍耐力，忍耐體制上暫時性的種種不便，透過教育，讓自身成為文明之民，就可以擺脫殖民的桎梏。〈夏時衛生談〉闡述夏季衛生保健的注意事項，希望透

過預防改善疾病好發的現象。以上各式各樣的宣傳訴求，在在反映出台灣總督府改造同化台灣社會的企圖，而在這過程，也導入了諸多具有現代性特質的概念或生活習慣。

## 2. 推廣科學知識

接著談「科學普及」一類，科學新知的介紹，也是屬於知識教育的範疇，在該刊中可以看到各種不同領域的大量科普文章，如物理學方面，有專文介紹熱能的〈熱〉<sup>87</sup>、雜談各種物理現象的〈理科瑣談〉<sup>88</sup>。農學方面，則有談及花草培育的〈理科仙塚〉<sup>89</sup>，與作為上課教材使用〈初等農業〉<sup>90</sup>一文。此外，天文地理方面，有〈天文講話〉<sup>91</sup>、〈臺灣之暴風〉<sup>92</sup>、〈地震略說〉<sup>93</sup>和〈地文學要說〉<sup>94</sup>等，甚至有討論人類發展歷程的〈初民發達之狀態（岸本氏社會學一篇）〉<sup>95</sup>，可說是由各種不同面向，引介了各式各樣的科學新知。

綜觀來看，科學普及一類的文章，刊載數目較「教育修身」類為少，但性質相對較為純粹，主要針對知識範疇加以介紹或討論，幾乎看不到政治色彩。例如上述的〈臺灣之暴風〉，先介紹各國對颱風的名稱，再仔細說明颱風生成的原因，以及颱風侵襲台灣的路徑、數量和月分統計等等，文中所述皆根源於氣象調查統計的結果，充分展現出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但文中絕無一字談及政治，不像前述的「教育修身」類篇章，總在文字中夾帶官方政策的宣導。

87 東門史上，〈熱〉，《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3號（1903.04.25），頁7-8。

88 三屋大五郎，〈理科瑣談〉，《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7號（1903.08.25），頁2-6。光谷居士，〈理科瑣談〉，《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8號（1903.09.25），頁3-6、19號（1903.10.25），頁9-11、21號（1903.12.25），頁5-8。

89 東門小史，〈理科仙塚〉，《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4號（1903.05.25），頁6-9。

90 川上瀧彌撰，邱振成譯，〈初等農業〉，《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6號（1905.03.25），頁7-10。

91 和田彰述、謝汝詮譯，〈天文講話〉，《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5號（1905.02.25），頁7-9、36號（1905.03.25），頁5-7。

92 近藤久次郎，〈臺灣之暴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53號（1906.08.25），頁6-10。

93 三屋大五郎，〈地震略說〉，《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32號（1904.11.25），頁7-10。

94 光谷居士，〈地文學要說〉，《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2號（1904.01.25），頁6-9、27號（1904.06.25），頁6-8、28號（1904.07.25），頁7-9。

95 東門小史，〈初民發達之狀態（岸本氏社會學一篇）〉，《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4號，頁2-6、15號（1903.06.25），頁6-9。

然而，值得討論的議題是，我們如何看待這些由日本人所導入的現代性知識或思潮。吾人可以分成兩個角度來討論，首先是現代新知的啟蒙，其次是殖民體制的鞏固。《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這份以教育工作者為閱讀核心群的雜誌，將漢文視為溝通工具，確實有效的將新的思潮或科學知識引入台灣，為台灣社會開啟了一道接觸世界潮流的啟蒙之窗，站在時代進步的立場來看，這點無疑是必須加以肯定的。

但隨著啟蒙教育一同進入讀者視野的，還有以假藉文明之名，滲透其間的修身標準，這些宣揚教育普及、衛生觀念，乃至於社會公德心的文章，或多或少都隱含著晉身於文明、同化於日本的意涵，讓接受教育的台灣知識菁英，在接受新思潮的過程中，連帶產生對於日本國族文化的認同，這樣的教育現象，根源於殖民體制的同化需求，即是所謂的「殖民現代性」。

## （二）所謂「除三害、興三利」

「殖民現代性」的特質，在《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第53號刊登的〈或問一章〉一文中彰顯無遺。<sup>96</sup> 篇名下作者自註「乙巳歲答清人問者」，作者載明「南清遊寓佐倉達山」<sup>97</sup>。

佐倉達山（1861-1941）與台灣淵源頗深，1895年5月隨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記來台，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員，為首批來台日籍官僚。在台歷任高階警務主管，1899年調職返回日本。1903-1909年間，在福建福州先後擔任清國福建省武備學堂教習、全閩高等巡察學堂總教習。1911-1913年間，再度來台擔任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囑託，多次到台灣深山從事蕃人調查並寫成多篇相關文章。<sup>98</sup> 透過這些訊息，可以瞭解本文創作於明治38年（1905），是作者宦遊清國福州期間，答覆清國人對「日本統治台灣，成效何以如此快速」的疑問所寫，可視為日本人宣揚對台灣殖民政策的系統性論述。該文如此起筆：

96 佐倉達山，〈或問一章〉，《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53號（1906.07.25），頁5-6。

97 同註96，頁5。

98 廖振富、張明權編著，《在台日人漢詩文集》，頁249-252。

或問余曰：「日本經營臺灣，未滿十年，而閩鄉靜謐，百廢俱興。昔化外之境，一變為天賦良土，何所施設而然歟？」。余應曰：「日本由馬關條約，受此地割讓，當時李文忠謂：『臺灣之為地，百害千弊。日本得之害多而利少，未久而放棄矣。』。日本政府有所見，先以除三害、興三利為行政之方針，自彊不息，終奏今日效果」。<sup>99</sup>

以清人對他提出疑問破題，其實正是為了下文的論述蓄勢。他先以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時說的「臺灣之為地，百害千弊」，日本終將放棄的判斷，從反面論證日本政府的遠見，筆下似乎不勝得意。接著提出總督府以「除三害、興三利」為行政方針，下文即環繞此一主軸展開論述。所謂的「三害」，指的是環境疫病、漢人土匪與原民蕃害，總督府分別以清潔環境、廣設醫院來除疫；用清查戶口、軍警嚴刑來剿匪；最終則是懷柔原民、使其馴化無害，這三項施政即是所謂的「除三害」。至於「興三利」，則意指推行國語教育、興建交通設施與開發台島資源，佐倉認為透過教育，可以讓台灣人融入日本社會，而交通與拓墾，讓百姓易於營利，國家稅收也會增加，自然可以達到民富國強的境界。

隨後，文中提出第二個問題：「或曰由臺民之說，自日本領茲土，民之納稅倍於昔日」，<sup>100</sup>也就是質疑日本領台後，台灣人得處於高稅賦的困境。面對此一質疑，文中坦承台灣人確實得繳納高額稅賦，但若考量前述多項政策的施行，徵收高稅額投注於政務，是無法避免的狀況，但這終究比繳納低稅賦，但生活毫無改善來的好。

本文值得玩味之處，在於反映日治初期臺灣殖民地政務的統治方針。文中所謂的三害，實質上即是妨礙日本控制台灣的三個因素。所謂的「土匪」多是武裝抗日的漢人游擊隊，而各原住民族堅守傳統生活領域，則成為統治者所謂的「蕃害」。疫病盛行，則因日人由境外移入，不習慣台灣風土環境、對特有

99 同註96，頁5。

100 同註96，頁6。

疾病缺乏免疫力，如何克服問題，有效遂行統治是日治初期重要的政治課題，而文中也記載了臺灣總督府的應對之道。

興三利，則反應日本獨特的殖民地統治觀，當時殖民地經營的主流理念，否定了殖民地同化的可能性，採用高度資源掠奪的方式經營殖民地，但日本基於同文同種、文化親近的因素，決定在台島施行同化政策，希望永久性的將台灣融入日本國體之中，這份理念反應在政策上，即是作者所謂的「興三利」。一方面透過國語教育讓台人瞭解日本文化，逐漸成為日本國民組成的一環，另一方面則戮力建構交通網絡，除了方便拓墾台島資源，供作建設營利之用外，也讓總督府的控制力量，能夠遍及到台島的每個角落。

以今日眼光來看，綜觀整個日治時期，諸多殖民政策雖與時更迭，但「同化」與「永居」這兩個本初之心，一直是殖民地政治的核心要素，這促使日人在台灣建設了大量的基礎設施與普及教育，讓台灣逐步過渡到現代化的社會之中，但台灣社會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失去主體性，融合入日本殖民體制之中，現代化的啟蒙與革新，終究是殖民統治此一核心目標下的附屬品。

### （三）梁啟超〈禁早婚議〉被抄襲挪用的複雜意涵

前文在論述「現代啟蒙知識的導入」時，曾提及三屋大五郎以〈論早婚為教育之害〉、〈論早婚害於傳種〉兩篇文章抨擊台人風俗早婚之弊端，經筆者追查發現：這兩篇文章，連同另一篇更早刊出而未署名的短文〈早婚速老〉，其實都出自梁啟超的文章〈禁早婚議〉，只略添加少數針對台灣現況的文句而已。梁啟超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力人盡皆知。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到日本。1902年2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禁早婚議〉一文即刊登在1902年12月出版的《新民叢報》上。<sup>101</sup>他基於強國強種的迫切改革需求，強烈主張應該禁止早婚，並指出早婚有：「害于養生、害于傳種、害于養蒙、害于修學、害于國計」五大弊端，陳述極為詳盡。

筆者推測：當時在台灣擔任教職的三屋大五郎，因目睹台灣人習慣早婚，

101 梁啟超，〈禁早婚議〉，《飲冰室全集（一）》（台北：文光圖書公司，1999.07）。

甚至在國語學校發現常有學生因早婚而中輟學業，造成人才培育的損失。恰好同一時間，看到梁啟超剛發表的〈禁早婚議〉而深有同感，乃以幾近抄襲的方式，摘選〈禁早婚議〉部分段落，拆成三篇文章，於明治36年（1903）2、3、9月分期刊登，力勸台灣人應該革除早婚的習性，詳見下表。

表4 《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抨擊「早婚」文章與梁啟超原文對照表

篇名	署名作者	刊登時間，卷期、頁數	備註
早婚速老	無	明治36年（1903）2月，第11號，頁20-21。	全文抄自梁啟超〈新民議·禁早婚議〉開頭第一大段。
論早婚為教育之害	三屋大五郎	明治36年（1903）3月，第12號，頁1-2。	全文主要抄自梁啟超〈新民議·禁早婚議〉「（四）害于修學」前半部內容。及「（三）害于養蒙」。
論早婚害於傳種	三屋大五郎	明治36年（1903）9月，第18號，頁1-3。	全文抄自梁啟超〈新民議·禁早婚議〉「害于傳種」一大段。

三屋大五郎只是更動極少數字句，<sup>102</sup>就直接標示自己的姓名，以現代著作權規範觀之，應屬抄襲行為。前面筆者曾考證：他常從日本出版的書籍、雜誌上，摘選中國詩話、日本文話、日本漢文家故事等，轉載於《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但這些作品多屬著名的中國古籍，他只能標示是「清陰逸人校訂」。至於抄錄、轉載梁啟超文章，卻標示自己姓名。比較合理的推測，其原因或許是基於日本人居於殖民者地位的優越感，或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藉以強化日本人的進步形象，故不願台灣人獲悉這種高論原來是出自中國近代名家之手。這也間接反映：當時日本出版的雜誌在當時的台灣流通極少，他才不必擔心抄襲行為被讀者發現。

筆者無意論斷三屋此舉的道德是非，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這種現象背後透露什麼訊息？其一，從梁啟超原作發表，到三屋大五郎改寫轉載，兩者時間

102 三屋抄錄梁啟超文章，對原文更動極少，只技巧性的轉化為台灣的情境。如梁啟超原文凡提到「中國、日本人之結婚，遲于印度而早于歐洲」而〈早婚速老〉則將「中國、日本人」一語，改為「臺灣、支那人」。又如〈論早婚為教育之害〉一文，以下這段：「余年來在本師範學校國語學校，屢見該校學生，修學未半，而妄早婚。曠焉廢焉，學業頓衰，復有不進者。抑是雖古來早婚慣習，所使其然，豈亦可不謂不思之甚者哉。」則是針對台灣現況而加上自己撰寫的文字。

差極短，顯見他主編該報對各種資訊的掌握相當快速。反之，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台灣人受教育者極少，資訊相當封閉，接收現代性知識的管道，不得不仰賴於日本人之手。這不只是台日雙方在吸取現代新知識上的落差，更是當時台灣人難以在現代性啟蒙論述上跟日本人相抗衡的根本原因。一直到1919~1920年代，台灣人始產生自覺性的民族運動，創辦屬於自己的雜誌、報紙，如《臺灣文藝叢誌》、《臺灣青年》、《臺灣民報》等。

其二，日本人向台灣「轉口內銷」梁啟超的現代性啟蒙論述文章，然而梁啟超的現代知識的吸收轉化，其養分來源，又與他在日本大量閱讀日本引介、翻譯西方現代新知的書籍密不可分。換句話說，三屋大五郎轉載梁啟超的文章，是為了改變台灣人的觀念，與梁啟超希望改變中國傳統舊習性的目標一致。但相關知識的根源究竟是來自西方、日本，還是中國？其中的多元混雜與思想形塑的駁雜性，乃至知識傳播路徑的多重迂迴曲折，都相當耐人尋味。<sup>103</sup>

## 六、結語

台灣學界對《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的研究，才剛起步不久，先前幾本學位論文與專書，對該雜誌的發行背景、內容屬性與同化意圖，都有良好的開展性論述，為後續研究奠定基礎。隨著雜誌數位化資料庫使用的方便性，相信日後將能帶動更多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在簡介該刊沿革、宗旨與內容之後，論述主軸集中在「日、台漢文交流的樣態」、「現代性啟蒙意識的導入及其駁雜性」兩大方向。希望能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之上，更細考察在明治時期

103 針對此一議題，2011年4月筆者曾在台北市文獻會主辦的「梁啟超遊台百年紀念座談會」中，發表如下看法：「梁啟超的文章本來是針對中國現況提出的主張，可是三屋大五郎將其包裝後，卻完全吻合台灣，因為兩者的社會習俗是一樣，有早婚的那種習性，民族性有所雷同。再者，梁啟超遊台時要林獻堂、林幼春他們讀的是日本人翻譯西方的東西，然後還教他們一套他自己發明讀日文的方法……。以上現象顯示：梁啟超與台灣人都受到日本人的影響，可是卻有一日本人抄梁啟超的文章勸台灣人不要早結婚，這其中的關係當中有非常多重複雜的糾葛，某一觀念或某種思想與主張的提出，究竟誰先誰後？誰傳播給誰？誰受到誰的影響？在日本、台灣、中國，乃至引介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其實不是那麼單線。」座談會由黃美娥教授策劃主持，出席學者包括吳文星、許雪姬、黃克武、廖振富、陳俊啟、翁聖峰等人，記錄全文，參見文獻會整理，〈梁啟超遊台百年紀念座談會〉，《臺北文獻》季刊直字176期（2011.06），頁1-46。筆者上述發言，見頁45。

的台灣（1902-1912），這份具有官方色彩的雜誌，如何將該刊做為日台雙方「漢文交流平臺」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且產生深遠的影響。

明治時期的《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論其主要內容，大致涵蓋兩大類，其一是屬於傳統漢文學領域的相關知識與創作，包括來自透過日本轉介的中國詩話、日本漢文學家介紹與文話知識分享，以及日台文人的漢詩文創作。其二則是出現在「論議」、「學術」等相關欄位，大量傳播現代教育與啟蒙知識的文章。本文乃針對這兩大類分行進行討論，以觀察其內容屬性的多元意涵。

經由本研究發現，該刊透過漢詩文知識交流與創作的互相切磋觀摩，不但增進日台文人彼此的情誼，台人也得以擴大知識視野，吸取日本漢詩文知識。在具體操作層面，日人編輯中村櫻溪、三屋清陰、初山衣洲等人以精湛的文學造詣，證明其漢學素養，並因而與台人吳德功建立深厚的情誼。而該刊轉載吳德功關於台灣歷史的著述，也一定程度促進日本人對台灣歷史的解。然而，透過詩文發表與針對作品的評點，日本人無可避免的仍洩漏了藉漢詩文以達籠絡與同化的政治目的。值得注意的另一焦點是，該刊主編三屋清陰轉載漢學知識的來源，除了〈龍江詩話〉是吳德功提供之外，其他都是從日本的書籍與雜誌轉載而來。其中甚至包括大量的中國詩話，這種日人向台人「轉口內銷」中國古典文學知識的現象，只存在於台灣被日本殖民的特殊歷史情境，頗堪玩味。

再觀察另一大類以傳播現代知識為主的論述文章，吾人得以理解，包括「教育與修身」、「普及科學知識」兩類文章，該刊對拓展台人的啟蒙知識上，確實貢獻卓著。我們必須理解，在1903~1912期間，台灣人透過殖民者的傳播引介，得以打開接觸現代世界的一扇窗口。不過日本殖民者的最終目標，乃是企圖將台灣人同化為日本帝國的現代化國民，台灣人若非意識覺醒，必將導致主體性的喪失。再者，由於知識傳播權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台灣人創辦屬於自己的新學刊物，以宣揚拒絕同化於日本為鵠的，還要等到1920年代前後，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與無奈。

另外，該刊在傳播殖民現代性時，出現一個極為特殊的案例，主編三屋大五郎直接抄襲梁啟超的文章〈禁早婚議〉，略加改頭換面，直接標示為其個人

作品。此一案例，足以提供吾人省思：在20世紀初期的東亞地區，由於中國、日本、台灣具有同樣的漢文背景，不論是傳統漢學或現代啟蒙知識，其知識來源與傳播路徑，都同樣具有複雜多元、曲折迂迴的交疊關係，這種現象值得持續深入探討，或許對吾人瞭解近代東亞文化政治的多重發展脈絡，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 附錄

《臺灣教育會雜誌》轉載中國詩話、介紹日本漢文學文章一覽表<sup>104</sup>

篇名	編者署名	刊登時間	卷期	刊登欄位	屬性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詩例	清陰逸人	明治36（1903）年 2月25日	第11號 頁12-14	文藝史傳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詩例	清陰逸人	明治36（1903）年 3月25日	第12號 頁9-12	文藝史傳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話詩例（承前）	清陰逸人	明治36（1903）年 4月25日	第13號 頁10-12	文藝史傳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東坡詩話拔抄	清陰逸人	明治36（1903）年 5月25日	第14號 頁14-16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唐釋皎然詩式	清陰逸人	明治36（1903）年 6月25日	第15號 頁14-16	文藝史傳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唐釋皎然詩式（承前）	清陰逸人	明治36（1903）年 7月25日	第16號 頁12-14	文藝史傳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宋蘇轍撰述詩病五事	清陰逸人校	明治36（1903）年 8月25日	第17號 頁14-16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詩辯	宋嚴羽述 清陰校訂	明治36（1903）年 9月25日	第18號 頁16-18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白石道人詩話	清陰校訂	明治36（1903）年 10月25日	第19號 頁16-18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秋星閣詩話	明李沂述 <sup>105</sup> 清陰校訂	明治36（1903）年 11月25日	第20號 頁17-20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104 張瑜庭的碩士論文〈日本與台灣漢學連結：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11）研究〉，頁57-58有類似的一覽表，但出現錯誤。如其欄位第一項是「唐子西文錄」，刊登卷期與日期都是錯誤的，其附註163之刊登說明，則屬正確。

105 李沂應是清人，此處誤記。

放翁詩話抄	清陰逸人	明治36(1903)年 12月25日	第21號 頁15-18	文藝史傳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近世詩人小傳 (日本)	三子恒	明治37(1904)年 1月25日	第22號 頁11-14	文藝史傳	日本漢詩人介紹
拙堂文話評	清陰逸人	明治37(1904)年 1月25日	第22號 頁14-18	雜錄	日本漢文學介紹
拙堂文話評 (承前)	清陰逸人錄	明治37(1904)年 2月25日	第23號 頁20-22	雜錄	日本漢文學介紹
拙堂文話評 (承前)	清陰逸人	明治37(1904)年 3月25日	第24號 頁11-14	雜錄	日本漢文學介紹
拙堂文話評 (承前)	清陰逸人	明治37(1904)年 4月25日	第25號 頁12-15	雜錄	日本漢文學介紹
拙堂文話評 (承前)	清陰逸人	明治37(1904)年 5月25日	第26號 頁7-10	雜錄	日本漢文學介紹
清袁枚續詩品	清陰逸人	明治37(1904)年 6月25日	第27號 頁13-15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清袁枚續詩品 (承前)	清陰逸人	明治37(1904)年 7月25日	第28號 頁16-18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本朝文苑故事 (日本)	東門小史	明治37(1904)年 7月25日	第28號 頁18-20	雜錄	日本漢文學介紹
宋張戒歲寒堂詩 話	清陰逸人評 訂	明治37(1904)年 9月25日	第30號 頁20-22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誠齋詩話鈔	清陰逸人	明治38(1905)年 12月25日	第45號 頁15-16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唐子西文錄	清陰逸人校 訂	明治39(1906)年 3月25日	第48號 頁15-18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徐而庵詩話抄	清陰逸人	明治39(1906)年 6月25日	第51號 頁17-19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誠齋詩話要錄	清陰逸人	明治39(1906)年 7月25日	第52號 頁15-17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徐而庵詩話抄 (承前)	清陰逸人	明治39(1906)年 10月25日	第55號 頁17-18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徐而庵詩話抄 (承前)	清陰逸人	明治39(1906)年 11月25日	第56號 頁16-17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徐而庵詩話抄 (緒)	清陰逸人	明治39(1906)年 12月25日	第57號 頁16-17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龍江詩話(八 則)	清陰逸人	明治40(1907)年 9月25日	第66號 頁16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龍江詩話十則	清陰逸人	明治40(1907)年 11月25日	第68號 頁14	雜錄	中國古代詩話引介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中島利郎、宋子紘編，《臺灣教育——總目錄·著者索引》（台北：南天書局，2001.10）。
-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台北：南天書局，1997.12）。
- 朱岐祥、許建崑主編，《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11.11）。
-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上卷》（南投：台灣省文獻會出版，1992.05）。
- 神田喜一郎編，《明治漢詩文集》（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83）。
- 國語研究會編，《國語研究會會報》1號（台北：國語研究會，1900.05）。
-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一）》（台北：文光圖書公司，1999.07）。
-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07）。
- 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柒·文獻卷》（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12）。
- 廖振富、張明權合編，《在台日人漢詩文集》（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11）。
-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會雜誌》卷1至卷11（日本沖繩：ひびぎ社，1994.12）。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 又吉盛清著，潘淑慧譯，〈臺灣教育會雜誌——再版記及內容介紹（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3卷2期（1996.12），頁67-88。
- ，〈臺灣教育會雜誌——再版記及內容介紹（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3卷3期（1997.03），頁76-90。
- 王英志，〈《徐而庵詩話》精義發微〉，《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期（1983.12），頁51-56。
- 文獻會整理，〈梁啟超遊台百年紀念座談會〉，《臺北文獻》176期（2011.06），頁1-46。

#### （二）學位論文

- 李龍雯，〈三屋大五郎在台之教育及文筆活動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室屋麻梨子，〈《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張瑜庭，〈日本與台灣漢學連結：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11）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程怡雯，〈初山衣洲在台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黃敬堯，〈臺日漢文的跨界交錯：日治時期來台日人中村忠誠研究〉（台北：台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三、電子媒體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來源：<http://stfj.ntl.edu.tw/cgi-bin/g32/gswweb.cgi/login?o=dwebmge>，2014.08.25）。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來源：<http://xdcn.nmtl.gov.tw/twp/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828>，2008.11.17）。

「かんがくかんかく（漢學感覺）」網頁（來源：<http://ameblo.jp/k2600nen/entry-10181152770.html>，2013.09.12）。

